

清史编年



第七卷

嘉庆朝

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面对如火如荼的川楚陕白莲教起事，乾隆临终前拉着其子之手，频望西南，似有遗憾。自认资质平常的嘉庆为这个时代定下了『守成继业』这一主基调。当父皇的宠臣面对一束白练时，『和坤倒，嘉庆饱』的民谚迅即在朝野传宣。雍正曾说其父神武天授，他的技射不及皇考。到了嘉庆，文治武功皆乏称述。神武门遇刺时，百余之人，袖手旁观。天理教徒攻打皇宫，他承认虽然变起一时，却是祸积有日。君心无欲天下安，『守成』岂能守得住社稷江山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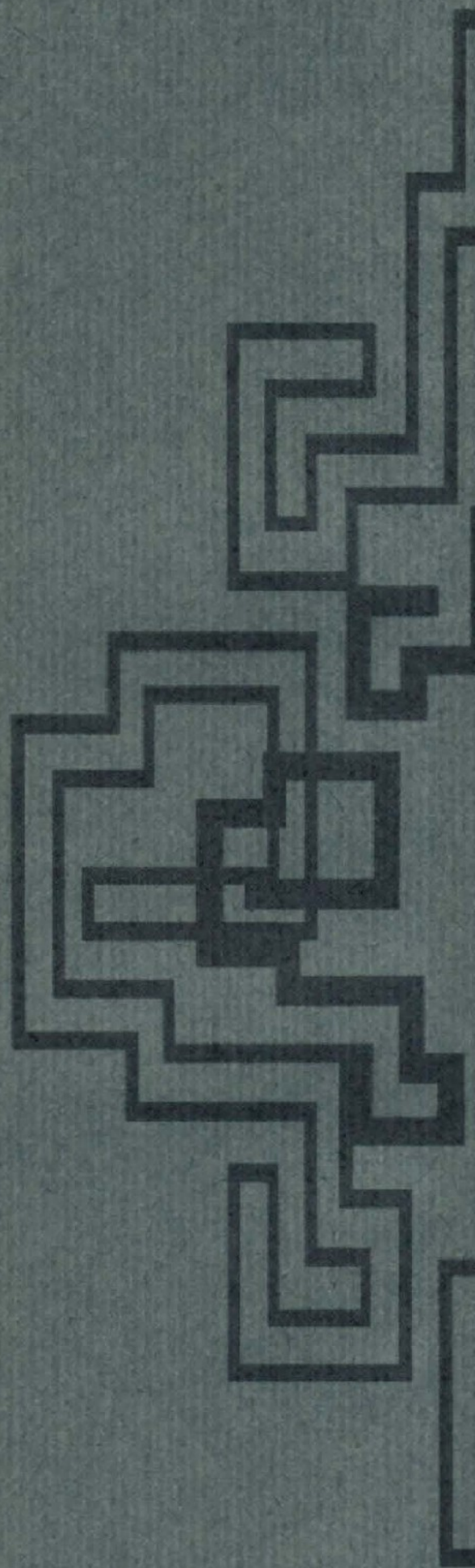
清史编年

第七卷 嘉庆朝

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
本卷编写 林铁钧

《清史编年》编委会

编 委：戴 逸 史 松 成崇德
李文海 林铁钧 郭成康
黄兴涛
主 编：李文海
副主编：史 松 林铁钧 黄兴涛



序 言

郭影秋

“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。”我们中华民族有一个很好的传统，就是每个朝代的更迭，都要尽快地为前朝修史，使我们祖国的悠久历史，得以世代地用文字记载下来，为我们今天研究祖国的历史提供丰富的史料。

汉代伟大的史学家、文学家司马迁的不朽著作《史记》，为“二十四史”之冠首。它详近略远，求真考信，记述了汉武帝以前中华民族的历史。全书“凡百三十篇，亦欲以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。《史记》无论从史学角度或是从文学角度，都给后人树立起一个治学的典范。《史记》是一部纪传体通史，而断代史应该从东汉班固所作的《汉书》开始，以后又有范曄的《后汉书》，陈寿的《三国志》。至唐朝初年，唐太宗李世民召集名流学者，设馆撰修《晋书》等前朝历史，辅臣房玄龄、褚遂良以及名宿令狐德棻、李延寿等，均参与其事。唐太宗还亲自为晋宣帝（司马懿）、武帝（司马炎）之二纪及陆机、王羲之的两传写了“制曰”，故《晋书》开卷即题“太宗文皇帝御撰”。这样，给前朝修史便成为历代开国的成规，开始了官修前朝史的先例。此后，宋修唐、五代史，元修宋、辽、金史，明修元史，清修明史，一朝接一朝，前后相继，修成了现存的“二十四史”，总括了我国有文字记载的三千多年的历史，为后世留

下了丰富的史料和经验。在我国伟大文化遗产宝库中，“二十四史”是一部相互接续、自成体系，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巨著。但是，以往各朝官修断代史，都受着时代和阶级的局限。在这些史书中，贯穿着宿命论、循环论、英雄史观等唯心主义思想，在处理国内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上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，甚至在体例和取材上还有很多可议之处。诚然，它们不可能发现和阐明中国历史的客观规律，正确地揭示历史发展的全部进程。因此，我们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，有分析有批判地继承这一历史遗产。

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。1914年，当时的北洋政府开设清史馆，着手编纂《清史》，至1927年编成初稿，命名《清史稿》。《清史稿》虽然搜辑排比了有清一代史事，具有一定参考价值，但此书错误缺漏甚多，有的观点也极荒谬。作为民国的官修史书，仍把武昌起义称为“谋乱”，将革命党人失败牺牲谓之“伏诛”等等，根本违背了已经改变的社会现实。所以，《清史稿》刊行不久，即遭到舆论的猛烈抨击，始终没有得到社会公认，未能进入“正史”的行列。

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是重视历史研究的，正如恩格斯所说：“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‘历史的启示’；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，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，甚至比黑格尔，都更重视历史。”但是，我们研究历史，为前朝修史，其目的和方法同历代修史有着根本性质的区别。我们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作为武器去研究社会历史，使历史研究成为科学。历史科学工作者的任务，就在于要发现和阐明历史发展过程的规律，用历史知识和历史经验提高人们的认识，充实和丰富人们的思想，为社会主义服务。四十年前，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号召时，明确地把研究历史，即“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，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”，当作了解中国国情，追溯渊

源，正确把握现实的重要基础。

近几年来，史学界注意了对清代历史的研究，无论从论文专著、档案文献的整理汇编，或者研究机构的建立和专业队伍的加强等方面，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。这不仅因为编写一部内容完整充实、具有较高水平的《清史》，填补为前朝修史的空白，完成老一辈革命家的遗愿，是历史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。更重要的是，大家对清史研究的重要意义，对清史研究与现实社会的关系，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。

清朝历史年代漫长，前后近三百年，各种类的典籍、档案、文献、资料等浩如烟海，在整理、归纳、编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，对其深入研究，当然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。而这项任务，决不是少数人和某些单位所能单独胜任完成的。如果动员起全国的清史研究力量，在统一领导下通力合作，有组织、有计划、有步骤地开展研究，我确信在不太长的时间内，是能够完成编写《清史》这一光荣任务的。

清史研究所编写的多卷本《清史编年》，开始陆续出版。它为清史研究提供不易搜集的资料和比较系统的线索，为高等学校文史专业和历史爱好者提供参考用书，无疑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。我国传统的史书，有各种不同的体裁，如纪传体、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等等。所有这些体裁，优缺点俱备，各有千秋，它们都以自己的特点立足于历史典籍的宝库。例如纪传体的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，编年体的《左传》、《资治通鉴》，纪事本末体的《通鉴纪事本末》等，都是我国史籍中的辉煌篇章。

《清史编年》实际上是一部编年体的清史长编，但它与旧的编年史书有所区别，主要在于它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，整理、分析、扬弃和归纳繁杂的清代史料；坚持实事求是，力求准确地揭示清王朝兴起、发展、衰落和覆灭的全部历史进程。当然，这项工作还仅仅是一种尝试和摸索，明显地取得上述

的这种效果，还须加倍努力，锲而不舍地做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。

《清史编年》依据之史料主要采自官书。清代官书汗牛充栋，卷帙浩繁，仅一部《清实录》即多达四千三百卷。官书对统治者通常是隐恶扬善，忌讳直言，因此或者删节要害，或者粉饰真相，所以不能完全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。但官书史料齐备完整，时间较为准确，来源于档案文件，大事一般不漏，比私家著述更为系统。《清史编年》取材以官书为主，兼采文集、笔记、稗史、碑传、谱牒、档案等，以便互相印证补充，借以辨别历史真象，充实丰富编年内容，这种方法还是可取的。

无论如何《清史编年》毕竟是历史科学这个百花园中的一棵幼苗，我祝愿它茁壮成长，为实现伟大社会主义现代化，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，做出应有的贡献。

前 言

李文海

《清史编年》从1985年出版第一卷，到现在12卷全部出齐，由于诸多原因，前后经历了15年时间。如果从开始组织力量编撰此书的1980年算起，则已经整整20年了。

20年时间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也不短。这有两层意思。一层意思是老话：在历史长河里，20年时间只不过是转眼一瞬，套用我读小学时做作文常用的八股腔，真是“如白驹之过隙”；但对于个人来说，却占用了全部学术生命的三分之一左右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学术工程。还有另一层意思：用20年的时间搞一部书，在如今某些“倚马万言”、“一年可以出好几部著作的才子们，或那些善于抓住“商机”、个把月就可以编出一部什么“大全”之类的“攒书家”看来，一定会觉得不但迂得可笑而且傻得可怜。但是，历史上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编著一部书，其实倒是很普通、很常见的事情。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《史记》，前后写了14年。班固的《汉书》，经过25年的努力始告完成。被后人誉为“史家绝作”的《资治通鉴》，写作过程历时19年。谈迁的《国榷》，由于经历了特别的坎坷，写作时间竟长达35年之久。这里我必须赶快申明，提到这些，丝毫没有要把这部《清史编年》挤进那些史学经典和学术巨著行列的意思，只不过是就时间论时间，从《清史编年》的经历生发出一点这

样那样的感慨。

编写《清史编年》的任务，最早是由我们敬爱的老校长、著名明清史专家郭影秋同志提出的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、周恩来、董必武以及稍后的邓小平同志等，都曾经提出并关心过编写清代历史的任务。为了落实他们的指示，中国人民大学专门成立了清史研究所，以便集中力量、集中时间编写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大型《清史》。郭影秋同志提出，编写《清史》，首先要从基础工作做起，要在搜集资料、理清史实的基础上，先编一部清代历史的大事记，然后再从各个方面拓展对清代历史的研究。根据影秋同志的意见，清史研究所组织了由林铁钧、史松同志牵头的专门力量，从事此项工作。这项工作的成果，就是这套由戴逸同志拟定书名的《清史编年》。

《清史编年》编撰的指导思想和写作原则，影秋同志在《序言》中已经作了精辟详尽的论述，修订再版本将这篇《序言》列于卷首，同时重印了原书《凡例》，以便为读者的阅读提供方便。

清史研究是本世纪才开始诞生并得到迅速发展的一个史学分支学科。近年来，清史这个领域，吸引了愈来愈多的国内外史学家们的研究兴趣，也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普遍关注。这种现象的出现，首先是由这门学科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。清朝是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。在这个王朝统治时期，中国经历了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到落后的历史转折，经历了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历史转折，也经历了由中世纪到近代社会的历史转折。正是在这种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中，蕴含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内容，也同今天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了紧密的联系。不仅今日之版图疆域及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人口基数奠定于清朝，而且当代中国的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军事、外交、民族关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，也大都是由清朝演化、延伸而来。可以

说，要深刻了解中国的国情，离不开对清代历史的科学认识。清史研究具有极为强烈的现实意义。

《清史编年》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诸多科研成果之一。这是集体研究的成果。第一卷由史松、林铁钧负责编写；林敦奎、徐滨、向晓、罗远道、曹月堂、胡又环、陈洪等同志曾先后提供了参考资料。第二卷和第三卷由林铁钧、史松主编；陈洪、胡又环、罗远道、孙家骧、袁定中、向晓、曹月堂、徐滨等同志参加了编写。第四卷由史松主编；向晓、胡又环参加了编写。第五、六卷由郭成康编写。第七卷由林铁钧编写。第八卷由陈桦编写。第九卷由尹福庭编写。第十卷由杨东梁、谭绍兵、黎烈军编写。第十一卷由潘向明编写。第十二卷由迟云飞编写。

黄兴涛同志认真审阅了第六卷以后的各卷书稿，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。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孟超、刘仰东同志付出了许多心血和劳动。没有他们的努力，这部书要在本世纪的最后一年出版，实在是极不容易的。

2000年2月25日于

中国人民大学林园

凡 例

一、《清史编年》所采用之文献史料，经考核查对，均注明出处。凡未注出处者，即引自清代历朝实录。

二、全书以清朝年号纪元，农历纪事，标明干支、公元，按年月日顺序逐条编撰，某些事件则集中归纳于一条或数条。

三、全书纪事以日期为基限，凡日之不能定者附于“是月”，月之不能定者附于“是春”、“是夏”等，春、夏又不能定者附于“是年”，年不能定者不记或作说明。

四、凡本书所用文献史料之来源、重要人物之简历、满文名称之汉译、说法迥异或存疑待考的重要史料以及充实正文的其他补充文献等，均酌情予以必要的注释。

五、为保存文献史料的完整及便于使用，本书较多地引用了原文。凡加引号者，除予以标点外，均保留原貌，不改一字。书中使用“谕”、“御”、“朕”、“敕”、“奏疏”、“得旨”等，乃沿用文献之术语。原文中对抗清力量 and 人民起义诬称“贼”、“寇”、“叛”、“逆”等词，已为读史者所熟知，一般未予改换。

六、全书以突出各朝具有深刻影响的大事为主，同时兼顾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历史事件。包括中央和地方政权机构之设置、沿革、裁并，重要官员之任免升调罢革及品级变更等；主要典章制度，如世爵、礼仪、官制、兵制、赋役、税收、科举、刑名、漕运、驿递等；具有重大影响的政策措施，如圈地、逃人法、迁海、垦荒、治河、开矿、鼓铸、贸易、水利、修路等，以及每年全国人丁户口、田亩、赋税、铸钱制钞等综合数字，均分别予以

归纳汇集，按时间记述。

七、民族关系为清王朝建立和巩固对全国统治的重要内容。凡满汉关系，清廷对各少数民族的政策，以及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之交往，包括册封、朝觐、入贡、规章制度和双方之军事行动等，都予以记述。立国之初，独立于清朝之国内其他政权，记其主要活动。

八、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，凡规模较大、影响甚广者皆记。确知其性质者，如农民阶级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武装行动，一般称为“起义”、“农民起义军”。不能确知其性质者称“起事”。

九、清朝统治者（包括宗室皇族）之活动，凡皇帝之即位、逝世及其他重要活动，包括政令之发布（如诏书、上谕、朱批、敕文）、出巡、亲征、狩猎、庆典、后妃册封以及宗室内部相互倾轧、继嗣斗争等，视其内容或详或略记之；凡亲王、郡王、贝勒、贝子、公等之爵位封袭降夺，择其重要者记之。

十、重要之政治事件（包括重大案件）及军事行动、其影响大历时长者，则详记其始末。重要学者之主要活动、重大科技发明创造、重要学术著作之完成、重要官书之编定、重大自然现象和自然灾害等皆记。

十一、对外关系，凡使臣相互往来、贡赏、通商、交涉、订约、传教士来华以及抵御外国入侵活动等等，择其重要者记述。

十二、清历朝帝王，均书其年号，如顺治朝之福临称顺治帝，雍正朝之胤禛称雍正帝等；各地之南明政权，也记其年号，如南京之朱由崧称弘光帝，西南之朱由榔称永历帝等。

目 录

嘉庆元年	丙辰	公元 1796 年		(1)
嘉庆二年	丁巳	公元 1797 年		(41)
嘉庆三年	戊午	公元 1798 年		(83)
嘉庆四年	己未	公元 1799 年		(115)
嘉庆五年	庚申	公元 1800 年		(197)
嘉庆六年	辛酉	公元 1801 年		(251)
嘉庆七年	壬戌	公元 1802 年		(297)
嘉庆八年	癸亥	公元 1803 年		(335)
嘉庆九年	甲子	公元 1804 年		(375)
嘉庆十年	乙丑	公元 1805 年		(403)
嘉庆十一年	丙寅	公元 1806 年		(437)
嘉庆十二年	丁卯	公元 1807 年		(475)
嘉庆十三年	戊辰	公元 1808 年		(499)
嘉庆十四年	己巳	公元 1809 年		(533)
嘉庆十五年	庚午	公元 1810 年		(567)
嘉庆十六年	辛未	公元 1811 年		(593)
嘉庆十七年	壬申	公元 1812 年		(625)
嘉庆十八年	癸酉	公元 1813 年		(649)
嘉庆十九年	甲戌	公元 1814 年		(693)
嘉庆二十年	乙亥	公元 1815 年		(725)
嘉庆二十一年	丙子	公元 1816 年		(753)
嘉庆二十二年	丁丑	公元 1817 年		(773)

嘉庆二十三年	戊寅	公元 1818 年		(793)
嘉庆二十四年	己卯	公元 1819 年		(815)
嘉庆二十五年	庚辰	公元 1820 年		(841)

嘉庆元年 丙辰 公元 1796 年

正月初一日戊申（1796 年 2 月 9 日）

皇太子颙琰^①即皇帝位。是日，颙琰侍乾隆帝至奉先殿、堂子行礼，后赴太和殿，举行传位大典。乾隆帝亲授宝玺^②，皇太

① 颙琰：乾隆帝第十五子，初名永琰，立皇太子后讳名颙琰。乾隆二十五年十月初六日丑时生于圆明园之“天地一家春”（九州清宴殿中之一偏殿）。生母魏氏，原任内管领后加封承恩公清泰（世为内务府包衣）之女，乾隆二十四年晋封为贵妃，三十年晋皇贵妃，生育有皇七女和静公主，皇十四子永璂、皇九女和恪公主，皇十五子永琰、皇十六子（未名夭折）、皇十七子永璘。乾隆四十年卒，终年四十九岁，立永琰为皇太子时，特册封为孝仪皇后。永琰六岁（虚岁），即入上书房读书，读五经识字。四十一年五月，命侍讲学士朱珪入上书房，专任永琰之师傅，永琰受朱珪影响颇大。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初，乾隆帝遵家法，密建皇储，书写立永琰为皇太子帖藏于锦匣，存放于乾清宫“正大光明”匾后。据乾隆四十八年九月初三日谕旨，则称该匣“常以身随”。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封永琰为和硕嘉亲王。六十年九月初三日，乾隆帝已届八十五岁，又因登基之初，曾以在位六十年即归政告天，故于勤政殿集皇子、孙、王、公大臣等，当众启开密缄，取二十二年前所写御书，册立皇十五子永琰为皇太子，移居毓庆宫。且祇告天地宗庙社稷，于丙辰年元旦继承大统，即皇帝位。及即位，永琰已满三十六岁。

② 据朝鲜《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》下编卷一二记载，朝鲜进贺使赵尚镇、副使徐滢修进闻见别单，其中有“传禅时，临当受贺，高皇帝不肯与大宝，刘墉止贺曰：‘古今安有无大宝之天子？’遂即入奏高宗曰：‘陛下不能无系恋天位之心，则传禅可已。传禅而不与大宝，则天下闻之，谓陛下何如？’半日力争，卒得大宝而出，始行贺礼。”

子跪受，礼毕乾隆帝返宫。皇太子遂于太和殿即位，改是年为嘉庆元年，颙琰通称嘉庆皇帝，尊奉乾隆帝为太上皇帝。

是日，礼部鸿胪寺官在天安门楼上，宣读乾隆皇帝传位诏书，颁行全国。诏书云：“御极以来，平定伊犁、回部、大小金川，扩土开疆数万里。缅甸、安南、廓尔喀^①以及外藩属国，咸震摄威棱，恪修职责，其自作不靖者，悉就殄除。功迈十全，恩覃六合。普免各省漕粮者三，地丁钱粮者四。展义巡方，行庆施惠，蠲通赈贷，不下数千万亿。振兴士类，整饬官常，嘉兴万邦黎献，海隅苍生，同我太平。”“回忆践阼初元，曾默吁上苍，若纪年周甲，当传位嗣子，不敢仰希皇祖^②以次增载。”“特宣布诏旨，明定储位，以丙辰为嘉庆元年。”“皇太子于丙辰正月上日即皇帝位。朕亲御太和殿，躬授宝玺，可称朕为太上皇帝。其尊号繁文，朕所弗取，毋庸奏上。凡军国重务、用人行政大端，朕未至倦勤，不敢自逸^③。部院衙门及各省题奏事件，悉遵前旨行。”诏书还发布赏赐恩赦款项多条。

此后，太上皇不时御殿受朝，嘉庆帝侍立或设小座位于旁。

初三日庚戌（2月11日）

据闽浙总督福康安、四川总督和琳于上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疏奏，攻夺湘西苗民反清据点擒头坡、骡马峒各大小山梁，焚其寨三百，清兵即可长驱直进平陇乾州。本日，帝谕福康安、和琳及从征官兵，大加奖赏。^④

① 廓尔喀，即今尼泊尔国。

② 皇祖，即康熙皇帝，在位六十一年。此处指乾隆帝在位不敢超越乃祖登极时限。

③ 自嘉庆元年至三年，本书中所用“帝命”及“帝谕”，多系指太上皇或太上皇授意由嘉庆帝谕出。

④ 《清仁宗实录》卷一。《钦定平苗纪略》卷二五。

初四日辛亥（2月12日）

奉太上皇命，册立颀琰嫡妃喜塔腊氏^①为皇后，侧妃钮祜禄氏^②为贵妃。册封刘佳氏为诚妃、侯佳氏为莹嫔。

本日，太上皇由皇帝陪侍，于宁春宫皇极殿举行千叟宴。凡亲王、贝子大臣官员，蒙古贝勒、贝子、公、额駙、台吉年六十以上，兵民年七十以上者共三千人，以及朝鲜、安南、暹罗、廓尔喀国贡使等参加。其中一品大臣及年九十以上者，召至太上皇座前赐酒。并未入座五千人，各赏诗章、如意、寿杖、文绮、银牌等物有差。

初十日丁巳（2月18日）

湖北参加白莲教^③之农民爆发起义。乾隆末年，清廷于各地大肆镇压民间秘密宗教，各地官吏以查拿邪教为名，四处搜求，

① 喜塔腊氏，原任总管内务府大臣副都统和尔经额之女。乾隆三十九年册为皇十五子永琰之嫡福晋，四十七年八月生第二子绵宁，即后来之道光帝。

② 钮祜禄氏，礼部尚书恭阿拉之女。初为皇十五子侧福晋。生有三子：绵恺、绵忻、绵愉。

③ 此时称之为白莲教，乃活动于楚川陕豫甘等省反清农民参加之各种民间宗教之通称，主要有混元教、荣华会、收元教、三阳教、西天大乘教等。乾隆四十年，混元教经卷与咒语单中，有“换世界”、“反乱年”、“未劫年，刀兵现”、“吾徒下方身遭难，不请师父无所靠”等带明显反清言论。昔时白莲教有参与推翻元王朝之历史，以后反明各种民间秘密结社，其信仰、教义乃至习教仪式，不少似与白莲教同出一辙。乾隆末年，因彼等之政治色彩而遭到清廷残酷镇压，故官方亦将此众多教派通称为白莲教。自嘉庆元年与白莲教战争爆发后，广大农民直接参加反清武装斗争，其组织形式也随之改变，除大掌柜外，主要有大元帅、都督、军师、总兵、先锋等，迷信宗教作为纽带发动农民之作用逐渐减少。